

作为认识来源的网络获取

肖 峰

(华南理工大学 哲学与科技高等研究所, 广东 广州 510641)

[摘要]当代信息技术全面而深刻地影响了人的认识活动,网络获取成为认识的重要来源就是这种影响的表现之一。网络获取使间接经验的形成及知识的习得具有了新的通道,它较之传统方式具有存量优势、增量优势、流量优势、选择优势和成本优势,所以它日益成为认识来源的主导方式。网络获取作为认识的来源方式也有自己的局限性,需要与实践获取及书本获取方式进行互补,需要处理好网络与现实的关系、读书与读屏的关系、获取信息与获取知识的关系以及使用技术与追求价值之间的关系。

[关键词]认识来源;网络获取;信息资源;读屏

[中图分类号]N0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934X(2020)03-0001-07

DOI:10.16573/j.cnki.1672-934x.2020.03.001

The Network Acquisition as a Source of Cognition

XIAO Feng

(Advanced Institute of Philosophy, Science and Technology, South China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Guangzhou, Guangdong 510641, China)

Abstract: Contemporary information technology has a comprehensive and profound impact on human cognitive activities, and the network acquisition as an important source of cognition is one of the manifestations of this impact. Network acquisition provides a new channel for the formation of indirect experience and the acquisition of cognition. Compared with the traditional way, it has the advantages in stock, increment, flow, selection and cost, so it has increasingly become the dominant mode to source of cognition. As a cognitive source, the network acquisition also has its own limitations. It needs to be complementary with practical access and book acquisition, deal significantly with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cyberspace and reality, between reading books and reading screens, between obtaining information and cognition, and between using technology and pursuing value.

Key words: source of cognition; network acquisition; information resources; reading screen

认识的来源问题是认识论中的一个重要问题。现代信息技术在今天的广泛应用,对人类的认识活动造成了广泛而深刻的变化,其中也包括对认识来源所形成的种种改变。从信息的

视角看,认识的来源,就是信息的获取方式问题(认识中关于对象的信息是如何获取的),也是知识和观念形成的通道问题。信息时代使得人的认识从过去主要来源于亲身实践和书本阅读

收稿日期:2020-03-01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15ZDB019);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重大课题攻关项目(18JZD013);北京市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15ZDA30)

作者简介:肖 峰(1956—),男,重庆忠县人,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科学技术哲学研究。

(C)1994-2023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cnki.net>

演化为主要来源于网络获取,使得间接经验在网络时代的获取方式成为认识来源的主导方式,并引发出一系列需要我们认真思考和对待的哲学认识论问题。

一、间接经验来源:从传统方式到网络获取

认识从接触对象、获取信息开始;获取信息的方式,就是了解世界的方式,就是认识来源的渠道。

在传统的认识论研究中,根据认识来源于感性认识还是理性认识,区分出经验论和唯理论两大认识论派别,前者认为人是通过感官把握认识对象的;后者认为人是通过理性思维把握对象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将实践作为认识的来源,认为只有认识的主体在和客体(对象)相互作用的实践中才能把握对象、形成认识,这就和包括旧唯物主义在内的其他哲学区别开来。

认识来源于实践,意味着人在与对象的直接互动或接触中,也就是主体在直接作用于客体的实践中获得关于对象的信息,形成的是关于对象的“亲知”或“体验”,也就是毛泽东所说的“直接经验”;就人类的整体来说,这是形成认识内容的主要通道。除此之外,认识还有另一种来源,即主体并未直接与客体交互作用而又获得了关于客体的信息或知识,这就是通过他人的“告知”“描述”“讲授”“记载”等方式而获知,即通过一定的中介来获知。广义地说,就是通过技术显现,即关于对象的各种形式的表征(语言、文字、图像等)来获取,通过信息技术获取的内容被称为“间接经验”。由此,将认识的来源从整体上区分为直接来源与间接来源两种。

间接经验的获取对于认识来源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恩格斯指出:“每一个体都必须亲自取得经验,这不再是必要的了;个体的个别经验在某种程度上可以由个体的历代祖先的经验的结果来代替。”^[1]毛泽东也指出:“一切真知都是从直接经验发源的。但人不能事事直接经验,事实上多数的知识都是间接经验的东西,这就

是一切古代的和外域的知识。”^[2]也就是说,人不可能每一事物都通过直接经验的方式去获知,随着人类的认识对象日益扩大,作为个体的认识者就会对越来越多的客体采用间接经验的方式去获知。事实上,单个认知主体,特别是“知识渊博”的认知主体,就其知识来源而言,通过亲身实践而获得的直接经验通常占比不大,而占比较大的知识是从“读万卷书”间接获取的。

认识的间接来源也可以区分为多种方式,根据媒介手段的扩展,从最初只有口耳相传,主要是通过“身体信息技术”(由人的身体器官所充当的传递与加工信息的手段)来获取,如口头告知的信息、口述的景物和事件、亲口相传的经验等,从知识的角度来说,就是他人口授的知识。随着历史上第二次和第三次信息革命的发生,器具信息技术(身体之外的某种人造物作为传递和加工信息的手段)被发明出来,人类进入文字和印刷的时代,间接经验的来源方式就有了从书信和印刷品获取的通道,书写的信息与书本知识等从此发挥提供间接经验的主导性功能,印刷时代的“读书人”就是从书本信息中获取基于间接经验的知识的典型代表^[3]。通过器具信息技术形成的认识来源通道,到了电子网络时代的今天,进一步有了基于互联网和计算机技术的新方式,即作为网络终端的各种电子媒体成为获取信息资源的重要渠道,简称为“网络获取”。

网络获取是一种新型的间接经验的来源方式。互联网作为承载知识和信息的虚拟载体,负载其上的内容并不是客观事物本身,而是以文字、图像、声音等形式存在的客观事物为表征。人们在互联网上接触和理解这些表征,就是间接反映客观事物的过程,所以它本质上属于间接经验形成的一种渠道。

从口耳相传和纸质文本中获取知识,是前网络时代间接经验(知识和信息)的主要获取方式,而今随着网络时代的到来,作为认识来源的间接经验则主要转型为网络获取。从总括信息

技术的发展历程中可以看到,间接经验的来源方式,历经了一个从口耳相传中得到文字获取,再到网络获取的替换过程,这也是信息技术革命的产物。由于网络技术的快速发展,以及网络上内容产业的日新月异,网络获取的优势越来越突出,以至于这种新的信息来源方式“异军突起”,取代了传统方式而居于主导地位。可以说,当电子网络成为一个新的表征系统后,它就必然成为一种重要的或主导性的新型信息渠道,当代信息技术使日益增多的认识对象成为技术化显现,这一特征具有功能上互相过渡甚至一体两面的关系:当越来越多的对象、事件、过程都是通过互联网来呈现和传播时,人的间接经验来源的主要通道当然就会转移到线上,从而导致网络获取成为主导性的信息来源途径。网络化的社会也是数据化的社会,鉴于此,可以将认识对象和认识来源的一体化变迁的关联进一步表述为:对象或事件被数据化(认识对象的技术显现),然后是数据被资源化和资源被网络化,就形成“网络资源”,而网络资源被渠道化,就演变为“网络获取”——这一网络时代最为重要的间接经验来源方式。

通过网络渠道获得的信息,成为认识主体进一步产生新的认识的“待加工的原材料”,也就是我们通常意义上所说的“信息资源”,甚至可以简称为“信源”,它指的是信息源或信息来源,是从信息论视角表达的“认识来源”。目前,网络成为巨大且主导的信源,是认识论的“认识来源”理论必须要纳入其视野中的新现象。

网络获取在日常生活中的表现,就是网络阅读。网络阅读是一种因阅读文本由纸张等传统载体转向电子网络虚拟载体而产生的新的阅读方式,它特指电子网络语境中的阅读行为,即借助计算机、智能手机等终端阅读网络文本、音视频等多媒体文件,以获取知识和信息。无论计算机还是智能手机,电子终端设备都是通过屏幕显示信息内容的,因此,网络阅读从形式上表现为“读屏”;又因为各种文本、图片、音视频等信息是通过电子网络传输和显示给各用户终

端,因此,网络阅读又被描述为“读网”;还因为存在于电子网络不同空间中的文本是以超链接的方式被组织在一起的,因此网络阅读又被称为“超文本阅读”,如此等等。

可以说,网络阅读已成为现代社会大众的一种主要阅读方式。自2003年以来,中国新闻出版研究院每年都要推出《全国国民阅读调查报告》,从2019年4月发布的第16次调查报告中可以看到,我国成年国民在2018年的数字化阅读方式(包括Pad阅读、手机阅读、网络在线阅读等)的占比为76.2%,而2017年为73.0%,一年中提升了3.2个百分点;2018年的图书阅读率为59.0%与2017年的59.1%则基本持平;2018年的报纸阅读率为35.1%,比2017年的37.6%下降了2.5个百分点;2018年的期刊阅读率为23.4%,也比2017年的25.3%下降了1.9个百分点。^①这表明网络获取已经取代了过去纸本获取的主导地位,并且其主导性还在逐年提高。这主要是源自当代信息技术的迅速发展而带来的电子阅读终端和电子网络的普及;源自计算机、智能手机和网络技术所形成的在提供优质信息资源上的高性能和低成本之共生优势。

二、网络获取的认识论特征

当网络成为主要的信源,网络获取成为认识来源的主要渠道后,人的认识活动也随之形成一系列新特征,如果将其与书本获取相比较,可以发现它具有如下一系列优势。

第一,存量优势。网络资源较之印刷品所能承载的资源具有存量上的巨大优势,形成了巨大的数据资源,^②而且通过云端存储形成了几乎无限的资源保存能力,当其作为信息来源时就表现为天文数字量级的字节信息,成为取之不尽的知识宝库,它对于任何人来说都是无穷的间接经验来源。这一存量优势也来自储存方式的先进性:网络的“互联”式储存使得蕴含各种知识的数据库可以在网上互相通达,形成全球共享的局面,改变了相互离散的信息孤岛

式的传统知识存储方式(如个人藏书或彼此分离的图书馆),使得我们可以通过超链接的方式从有限的文本延伸到几乎无限的在线资源,或使用搜索引擎的手段从少量的关键词字符牵引出应有的相关信息,对某一指定目标的知识形成“一网打尽”的获取效果。用“数据”来表达,各个领域的信息储存所包含的数据量,通常都极为巨大,“大数据”就是这种信息存量巨大的一种表述,通过大数据的采集和挖掘技术,我们可以在数据获取的量级上借助网络而不断提升,所以信息哲学家弗洛里迪(Luciano Floridi)把数据库称为“明天的百科全书”,它超过了任何用户的容量。

第二,增量优势。互联网上每天都在增加新的资源,^③它也是迄今最能容纳新增资源(包括最新资源)的信息载体,因此作为认识来源,作为知识生产的“原料地”,网络几乎汇聚了人类有史以来所创造的和正在创造的所有知识,使知识生产者可以从中获取最新最丰富的智力资源。从数据的角度看,网上信息资源的增加,就是数据量每天每时的增加;大数据时代的来临,就是数据增量不断加速的结果。人类最新的知识成果主要是在互联网上得到最快的展现,只要有兴趣和精力,认识者每天都可在相关平台上获取最新的资讯,呈指数增长的知识也可以尽收网中。网络获取的这种增量优势也使其具有动态性,取之不尽,用之不竭,是一个日日新、时时新的知识宝库,这是任何纸本图书馆或档案库所无法比拟的。

第三,流量优势。网络获取中的资源并非静态的资源,而是动态流动中的资源,它随时处于流通状态,可以瞬时传递,具有极强的通达性、开放性,消解了资源需求者和资源储存库之间的物理围墙,使得被尘封于纸质文献中的资源被“解放”出来,在流动中被激活而实现增值,信息获取者由此也极大地提高了获取的效率。

第四,选择优势。网络获取的选择优势有多方面的体现:一是资源形式的选择优势。在现代信息技术的装备下,网络资源具有“电子集

成信息”的功能优势,集合众多视觉和听觉元素(在将来还可将嗅觉、触觉等元素集合进来),以多媒体为载体呈现出文字的、声音的、图像的、动画的、视频的等信息,从而满足不同偏好、不同接受能力的“受众”对不同信息资源的需要和选择,实现更高效也更人性化的信息获取效果。二是选择的主动性程度提高。从书本中获取间接经验的传统来源方式是被动的,即出版什么书都不是受众可以主动选择的,几乎只能是被动地接受;而网络获取则使受众具有了更多的主动选择权利,他们可以根据自己的需要搜索相关资源,可以在网页和超文本中寻找自己关注的内容,然后是“浅读”还是“深读”也主要根据自己的兴趣来决定。三是选择的智能化。网络环境中的数字化、数据化、算法化,作为认识来源之选择对象的资源在现阶段还具有了智能化优势,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聪明”地匹配我们的需求,向受众推荐和推送相关的信息资源,减少我们在获取有效信息过程中的时间和精力消耗,提高我们资源采集的效率和效果。目前的搜索引擎技术主要行使这一功能,它可以向我们优先显示质量较高的相关知识和信息,而对质量不高的相关知识网页则加以忽略。这种“主动迎合”的智能化资源是纸本资源无法比拟的优势之一。

第五,成本优势。书本曾经为人类打开了知识来源的新天地,而网络则近乎无限地扩展了这个新天地。书本作为间接经验的来源,受到多方面的成本限制,如个人不可能拥有太多的图书,即使通过到图书馆获取,图书馆本身也会受到存量(藏书量)限制、流量(副本量)限制、共享限制(书本作为物质实体的不可分享,只能一本一人使用),何况还有进入图书馆的时间、交通和资格等方面的限制。网络作为信息和知识获取的来源,则突破了上述的限制,许多资源可以免费获取,由此相比于传统的书本获取,网络获取的成本更为低廉。“今天,全球超过 1/3 的人口通过手机和计算机以相对低廉的成本生成自己的信息,并通过视频、音频、短信以接近

零边际成本的方式在互联网世界分享。”^[4]

当然,网络获取作为认识的一种新型来源通道,其优势并不限于以上五个方面。同时,它也存在若干不足或“劣势”,如网络资源在质量上参差不齐;又如它虽然具有成本优势,但也并非人人都可以使用网络作为信息获取的新渠道,其原因主要在于上网对一些人所形成的经济、社会、心理等方面的障碍,这些障碍包括缺乏必要的电脑或终端、一些人对网络没有兴趣、一些人不懂怎样去使用网络、对经济收入低的人来说上网收费太贵、一些“新技术恐惧者”(尤其是老年人)还会被网络技术所吓到,此外还可能因为没有足够的机会等。美国信息社会学家詹姆斯·凯茨(James Katz)将其归结为:设备缺乏、技术恐惧、经济困难、不感兴趣几方面。他认为,如果无视这些现象和原因,就会只将互联网看作是“巨型平衡器”,但实际上互联网产生着新的不平等,且是在“乔装成”可以很快地解决不平等的假象下带来新的不平等^[5]。鉴于此,网络获取也需要与认识来源的其他获取方式形成互补,这就需要处理好它与其他方式之间的关系。

三、网络获取的若干认识论关系

当网络获取成为间接知识的重要来源方式时,我们必须处理好如下一系列认识论关系。

一是网络获取与实践获取的关系。从实践中获取直接经验,较之从网络中以及从书本中获取间接经验更为根本,所以网络获取作为认识的来源归根到底是第二性的认识来源方式,是对实践作为第一性认识来源的补充,而不是取代。这也是读网络之书与读自然之书、生活之书之间的差别。

其实,早在出现“读书”这一知识获取方式后,一些人在“阅读大自然”或者“阅读生活”方面的能力就出现了衰退,甚至还在有的认识者那里导致了认识来源上的本末倒置,这种情况在网络获取中表现更甚:一些深度依赖网络获取信息的人,不再重视亲历亲知,从此疏于与现

实世界的直接互动,即不从实践中获取知识,而是将获知的一切寄托于网络上的信息资源。他们所看到的世界,几乎全部是从网上看到的世界,或者只习惯于从网上去看世界。一则网络笑谈深刻地讽刺了这一现象:一青年人想知道室外的天气,他不是自己走到窗前向窗外亲眼看一看是天晴还是下雨,而是发微信问附近的朋友“今天的天气如何”,否则他似乎就无法知晓外面的世界,这就是所谓:一旦关上电脑或忘带手机,“你就觉得与世隔绝”^[6],也是所谓“网络幽闭症”或“虚拟交往依赖症”,在有了微信之后就表现为微信成瘾:“早上不起床,起床就微信;微信到天黑,天黑又微信。”所以,如果将网络获取当作认识的唯一来源或第一性的来源时,就会导致认识来源上乃至整个生活中的技术异化,走向所谓“两耳不闻窗外事,双眼只看电子屏”的境地。

所以,网络获取这一新通道并没有否定实践作为认识来源的意义,只是使其表现形式具有了多样性,这种多样性使我们看到,在实践作为直接经验来源的基础上,间接经验的获取越来越依赖于网络获取,网络这一当代信息技术使得人的认识来源得到了极大的扩充和拓展。

二是网络获取与书本获取的关系,即读屏和读书的关系。目前,读屏作为网络获取的阅读方式,较之读书作为纸质资源的方式,呈现出日益增大的不平衡不对称,这就是前者的“强势”及后者的式微,在前面介绍的关于国民阅读的调查数据中就可以看出。

读屏与读书之间尽管不同,但两者之间也有密切的关联,这种关联也被概括为“现代阅读”与“传统阅读”之间的关系,有时还称读屏为“后现代阅读”,于是读书就成为“现代性阅读”,其原因在于作为印刷时代标志的书籍是导致现代性到来的重要根源,纸质书籍被广泛阅读(意味着公众识字率的提高)是一个国家进入现代社会的重要标志;而作为后现代的电子时代的信息载体则以“无纸化”为诉求,电子荧屏成为信息显现的主要载体,所以读屏就成为一种张

扬后现代主导性的阅读方式。

在如何看待读书与读屏的关系问题上,一种观点认为读屏完全不同于读书,另一种观点认为读屏也是读书,是电子信息时代的一种新的读书方式。前一种观点必然会认为公众读书量越来越少,是因为他们用更多的时间去读屏;后一种看法将网络阅读中所读的电子文献(电子图书、电子期刊)都视为读书,而且是更高效更人性化的读书,因为网上的内容无非是将纸质资源数字化、电子化的结果,电子终端犹如移动的图书馆,所以读屏无非是阅读另一种载体的图书,只是阅读方式发生了变化。

应该说,两者之间是异中有同、同中有异,所以读屏既是读书,又不是读书。它们都是人的阅读行为:从信息载体中摄取与接受信息。读屏之所以在阅读方式中超过读书而占据主导地位,是因为它具有许多优越性,除了前面列举的网络获取的种种优势之外,还可以列举如下一些好处:它可以使我们克服获得纸质书本时的多种多样的物理限制,只要可接触到屏显装置(如只要手机在手),就可以随时阅读,阅读的随时性、便利性由此显现。此外,读屏的优势还在于对碎片时间的有效利用,从而实现长篇阅读与短篇阅读的结合、快速浅读与慢速深读的结合、即时阅读与延时阅读的结合;读屏时,还可以借助多媒体的融合而实现多感官调动的阅读,将文字与音频、视频相融合,进而将阅读与休闲娱乐相融合,使“苦读”变为“悦读”,既更加人性化,也提高阅读效率,从而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凡此种种,表明读屏作为网络获取的方式在提高人们间接经验汲取的广度和深度上,较之传统的获取方式具有不可比拟的优势。

读屏与读书各有优劣,当两者在目前还并存的情况下,不同的人可以根据自己的偏好“各取所需”进而各施所长,形成因人而异的效果。乐于“一卷在手,书香长留”者,完全可以以读书为主读屏为辅;反之,那些以及时获取新知为迫切需要者,当然可以以读屏为主。如果进一步细分,在以读屏为主的人群中,有的是以读屏来

及时获取新知,有的则是读屏犹如玩屏,智能手机就是“智能游戏机”。可见,手机作为读屏的主要工具,具有“移动的图书馆”和“随身的游戏机”之双重属性,后者如果取代了前者,则读屏就完全丧失了阅读的积极价值,所谓学习进步、知识创造、人的发展等就成为空话。所以,这是我们应力求避免的“读屏的异化”。

当然,我们不会因为读屏的上述“风险”或“双重性”而弃绝读屏重新回到单一的纸质阅读时代。可以说,电子显现的无穷魅力是无论如何也不能完全由平面的纸张所替代的,网络获取较之纸质获取的比较优势是技术赋能的必然结果。在看到读书与读屏各有优劣的前提下,最优的选择无疑是互补性阅读,使两种阅读形成互惠关系。一些力求博采众长的阅读者正在将两者结合的途径上进行探索,如浅阅读后再延展阅读而进入深度阅读,再如碎片化阅读后再辅之以条块化整理,这或许也是科学式阅读与人文式阅读的融合。

三是网络获取信息和网络获取知识的关系。这是上一关系的延续,即从技术载体到内容形态的延续。信息和知识既是相关的,也是不同的,知识是从信息中凝练和提升出来的,是揭示规律性、把握一般性、解答为什么等问题的认识成果,而信息通常只回答“是什么”的问题。知识隶属于信息,是对信息加工后形成的更高形态的信息,掌握知识比了解信息需要更高的认识能力,通过“浅阅读”“浏览”的方式就能了解信息,而知识则必须通过“理解”才能掌握,所以从认识过程的要求来说,了解信息是初级的认识,理解和掌握知识才是高级阶段的认识,因此,网络获取活动不能停留于浏览信息的程度,不能止步于浅阅读,而要提升为从网络中获取知识,进而在网络中生产知识,即达到认识过程的更高阶段,使网络获取能够通向知识的发现和创造,这也是人类从事认识活动的重要目标。

四是网络获取中的技术与价值的关系。目前已有大量研究指出,网络中的信息呈现,包括信息搜索所获得的信息,并不都是客观的和全

面的,而是在背后受控于特定的信息推送技术,当然最终是受制于掌控这种技术的人或利益集团。所以在网络获取中,表层上或形式上具有自主选择,深层下则可能是受算法控制的被动接受。就是说,在智能化的信息设备上,我们从网络上获取的信息常常是智能推送或个性化服务后的结果,在其背后的算法控制使得我们所获取的内容、所看到的东 西,都是被设计和筛选的结果,其目的是要影响你的看法,做出合乎推送者利益的选择,而并非全面的相关信息。“我们大多数人认为,当我们在 Google 上搜索一个词时,我们都看到了相同的结果,这个结果就是根据公司知名度排序的算法所建议的结果,是基于其他网页链接的最权威的结果。但自 2009 年 12 月以来,这不再是事实。现在你得到的结果是,Google 的算法显示特别适合你——而其他人可能会看到完全不同的东西。”^[7]此时,技术设备、数据库和算法等决定你能获取什么,决定着你的间接经验之来源,也极大地影响着你在接下来的认识进程中得出什么样的结论。就是说,网络获取这种来源方式是价值渗透的认识环节,而且是这一现象存在的重点环节。这就为我们在网络时代获取全面而客观的信息,并在认识起点不至于“走偏”而提出了新的问题和更高要求,在一定意义上,这需要提高作为认识主体的网络获取者的包括算法素养在内的“网络素养”,能够洞悉信息推送的蛛丝马迹,从而广开网络资源的来源渠道,养成“兼听则明”的习惯,避免陷入“信息茧房”(information cocoons)^④的陷阱。

总之,处理好上述关系为的是充分发挥网络获取的长处,施展其扩充间接经验来源的巨大优势,同时又以其他来源方式弥补其欠缺,从而使网络获取可以进一步成为提升认识主体能

力的强大引擎。

[注释]

- ① 资料来源: http://www.sohu.com/a/309340047_154345。
- ② 预计到 2020 年,全球的数据总量将达到 35Zb,其中 75% 来自个人(主要是图片、视频和音乐),远远超过人类有史以来所有印刷材料的数据总量(200PB)。
- ③ 互联网每天产生的信息量大约 800EB,如果将其装在 DVD 光盘中要装 1.68 亿张,装在硬盘中要装 80 万个。
- ④ 桑斯坦(Cass R. Sunstein)认为,网络交往极易导向“群体极化”(Group Polarization),即物以类聚、人以群分,持有近似观点的人们更愿意进行沟通讨论,形成一种同质性的圈子文化,在其中不断强化其持续固守的偏向,最后有可能形成极端化的群体性观点,即当想法相似的人聚在一起的时候,他们最后得出的结论会比交谈之前的想法更加极端,于是排他性地与其他群体加深隔阂。久而久之,人就生活于“信息茧房”(Information Cocoons)之中,只听自己所选择的东西和愉悦自己的东西。参见[美]凯斯·桑斯坦.信息乌托邦:众人如何生产知识[M].毕竟悦,译.北京:法律出版社,2008:8。

[参考文献]

- [1]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3 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978.
- [2] 毛泽东.毛泽东选集(第 1 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288.
- [3] 肖峰.信息文明与共享发展的内在关联[J].长沙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7(6):1-9.
- [4] [美]杰里米·里夫金.零边际成本社会[M].赛迪研究院专家组,译.北京:中信出版社,2014:4.
- [5] [美]詹姆斯·E.凯茨,[美]罗纳德·E.莱斯.互联网使用的社会影响 上网、参与和互动[M].郝芳,刘长江,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7:37-38.
- [6] [美]盖瑞·斯默尔,[美]吉·沃根.大脑革命 数字时代如何改变了人们的大脑和行为[M].梁桂宽,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9:3.
- [7] E Pariser.The Filter Bubble[M].Penguin Books Ltd,2011:6.